

墨子里籍考辨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主编
杨晓宇
潘民中



主编 杨晓宇 潘民中

墨子里籍考辨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墨子里籍考辨

杨晓宇
潘民中

主 编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墨子里籍考辨

主 编 杨晓宇
潘民中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河南平顶山天广集团天龙彩印厂印制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50千字

1997年3月初版·香港 1997年3月初印

印数:1——1000册

ISBN 962-450-616-0/D·31306

定价:(人民币)12.6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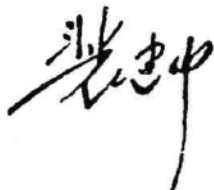
墨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所留传下来的《墨经》已被国内外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江泽民总书记曾在1991年5月15日访苏时发表讲话,把墨子作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代表,他说:“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二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一位思想家就提出过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主张”。这位思想家就是墨翟。墨子不但在列国纷争、欺小凌弱的战国时代创立了“非攻”、“兼爱”、“尚同”、“节用”等一系列主张和平、节俭利民的理论,而且还身体力行,助弱扶困;因而其学说深受广大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欢迎,被称为“平民圣人”,弟子群集,成为显学。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中外科学家也从《墨子》一书中认识到了更多的东西,在墨子研究上开拓了逻辑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赞誉墨子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当代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也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而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把墨子视为“智慧之星,科技之圣”。可见,对于墨子的历史地位,我们怎么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其里籍问题有些人还不十分明白,墨子里籍在鲁阳早就为历代史学界所认知,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明言墨子为鲁人。《路史·国名记》释“鲁人,则是楚之鲁阳”。清代大学者毕源、武亿均作过确切考述,并记入《鲁山县志》里边。由于近年一些地方在墨子里籍问题上突起新说,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新的

疑问,杨晓宇、潘民中同志主编的这本书,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墨子鲁阳里籍研究的大部分成果,给广大读者一个关于墨子里籍鲁阳说的较为全面的介绍,肯定会使墨子里籍问题更加清楚,会使墨学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更加发扬光大,会使墨子这一中国古代传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敬。

作为鲁山人,有关墨子的一些遗迹和传说是我早就熟知的。近年来,随着石人山风景游览区的开发和平顶山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更多的墨子遗迹展现在人们面前,也给墨子里籍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尽管鲁山地僻民穷,有的地方尚不足温饱,没有充裕的资金用于塑像建坊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这实际也有违于墨家节用尚俭的优良传统,但他们怀着对墨子的崇敬,用有限的力量,保护性开发了尧祠、墨城、墨子洞、墨子亭、土掉沟、黑隐寺、鲁阳文公墓、元结墓、牛皋故里、徐玉诺故里等一大批人文景观,以真诚的意愿和朴素的感情来寄托对历代乡贤的纪念。如今,墨子故里的人们,在党中央新时期富民政策的指引下,正在一步步脱贫致富,众多的矿产资源和山野特产,源源不断地流向祖国四面八方。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今天,鲁山县一定能够不断发挥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优势,向世界展示她的丰采与英姿。两千多年前墨子强国富民的愿望,也必然会在勤劳、勇敢、俭朴、友善的鲁山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变为现实。

谨此为序



一九九七年一月

墨子、墨学与墨子里籍论争

(代前言)

一、关于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是夏代大禹之师墨如的后代,生于春秋战国之交,“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荀卿列传》),其生卒年考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根据史书记载和古迹、口碑佐证,墨子生地当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二郎庙乡竹园村。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死后亦葬于此地。

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无论在近代社会科学或是自然科学诸学科里边,都能找到墨子思想的痕迹。因而,他被中外学术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科学之圣”。其著作《墨经》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可以说墨子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墨子的学说上承夏制,异于儒学,且其尚同、兼爱、节用、非攻、非儒、非乐等系统思想符合中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所以极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被称为“平民圣人”,成为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唯一可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代显学,《韩非子·显学》篇即谓:“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能突起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儒家学说分

庭抗礼,其一说明它弟子众多,力量强大,学说深入人心,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其二说明其能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墨子也曾携弟子游历楚、鲁、宋、齐等列国,比儒家更受欢迎,其原因主要在于能接近社会现实,经得起社会实践的考验,他的止楚攻宋和帮助鲁阳文君治理国家及对军械的研究、制作与应用等,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不可能遇到如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的结局。作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墨家产生于儒学势力薄弱的鲁阳,是有一定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基础条件的,墨子里籍在鲁阳的论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与文化发展规律的。

二、关于《墨经》

《墨经》即《墨子》一书,为墨家经典学说。该书部分为墨翟所著,部分为墨家弟子写入,是后来编进去的。《汉书·艺文志》记录《墨子》全书共七十一篇,高诱为《吕氏春秋·当染》篇作注时为七十一篇,但为同书《慎大》篇中注为七十篇,说明在汉代之前,《墨子》一书尚存七十或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五卷·目一卷”,与梁代典籍《子钞》、唐代《意林》等所述十六卷之数当为一致。《唐书》之后史书均记十五卷,可能其“目一卷”已佚。近代出版的《墨子》一书,实存《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节用上》、《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五十三篇,另有《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

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非儒中》九篇存目。

在《墨经》中,内容丰富,有记、有辨、有说、有论。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逻辑、数学、物理、技艺、治兵、军械、战术,用人、经世等,特别是尚贤、尚同、兼爱、节用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军事思想和军械制作技术,亦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数理学上的“小孔成像”理论,光学理论和几何理论等,都比国外相同理论的产生要早得多,只是到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地位一跃而成为历代之典,与其相对立的墨家从此一蹶不振,墨家经典之学《墨经》残存于其后传弟子之中,没有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便如此,其难以遮掩的伟大思想不时闪射出夺目的光辉。到了清代之后,随着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墨子》这一先秦显学重新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出现了毕源、武亿、孙诒让、胡适、郭沫若、张纯一、方授楚、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等一大批研究墨子的学者,并逐步由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向综合思想研究、里籍生平研究等多方面、深层次开拓,终于使墨学思想重新在中华大地上大放光彩。

三、关于墨学传承与组织活动

《韩非子·显学》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这说明,墨子弟子在墨子去世后,其内部亦产生较大分歧,致使分成三个较大的派别,各派都有明显的特点:“裘褐为衣,跣跣为服,日夜不休,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诵《墨经》而背诃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陶潜集·集圣览群辅录》)。其实,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墨翟弟子三个派系中的这主要两派,一是专在研究墨子的技艺之学而实践

之,重在应用;而另一派专于研究墨子的思辨之道,重在思想理论。但又因以上三派被后人统称为“别墨”,应该说,墨翟的主要传人及派系应是禽滑釐一脉。禽滑釐原为儒家弟子,因不满意于儒家之学,改投在墨家门下,是墨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墨家后传许犯、田系,又与其有明显的师承关系。那么,为什么在《韩非子》中所述墨离为三而无禽滑釐呢?根据徐州师院罗其湘先生的研究,墨家后来演变为隐灵教,主持教庭的人称“巨子”,高级弟子称“灵子”,一般弟子称“学子”。灵子又分为内传和外放两大类,内传弟子不涉外事,外放弟子不问内务,主要是为了隐教安全。禽滑釐为墨子之后第一个巨子。隐庭原无定所,随巨子之行踪而迁移。如按罗先生的这一观点,以上墨家传承中的一些难解之迷就可以找到答案。鲁山县发现的黑隐寺与墨子洞,有可能就是墨翟老年或其弟子创立隐灵教的原始教庭。禽滑釐为墨家祖师墨翟之后的第一位巨子,而相里、相夫、邓陵子三家别墨,是三个外放灵子。这些问题较为复杂,在此暂存一说,留待今后史学界进一步研究考证。

四、关于墨子里籍诸说

由于汉代之后墨家影响渐微,因而司马迁著《史记》时,并未把墨子及其学说放在“显学”位置,而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以“盖墨翟,宋之大夫,鲁人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也有学者认为在此句前还有文字,只因脱简已无从考。于是,在墨子里籍问题上,留下了千古悬案,历代史家相持不下,主要的就有四种说法:其一,为“外国人说”,1929年胡怀琛的《墨子为印度人辨》一文肇其始,他认为墨子面黑而称墨,家是印度人。其摩顶放踵,苦而为义,节用尚俭乃是佛教徒所为。卫聚贤撰文认为墨子是阿拉伯国人,他们共同认定的证据是墨子色黑,鼻高,不是中国人的面像。金祖同、陈盛良等也认为墨子是阿拉伯到

中国定居的回人,根据是《墨子》一书句法难懂,有回民族的句法。此“外国人说”一出,即受到史学界批驳。其二,是“宋国人说”。根据即《史记》中说墨子当过宋国大夫,《墨子》书中也有助宋拒楚的记述。但人所共知,春秋战国时代异国为官是正常的,甚至一人为数国之官。有为之士帮助别国治国打仗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把此作为确定墨子里籍的根据是说服不了人的。再者,《墨子》一书记载墨翟在宋国的活动虽有,但经调查,古宋国商丘一带并无墨子遗迹,也找不到任何记载墨子仕宋的资料,因而也是没有根据的,此说现已被史学界否定。其三是“鲁国说”。因《史记》上清楚地记载墨子为鲁人,持“鲁国说”者,认定此“鲁人”即“鲁国人”,此“鲁国人”即曲阜鲁国人。此说以清末孙诒让为代表,是针对高诱、毕源、武亿的“鲁阳说”提出来的。其后,有关墨子里籍的争论在“鲁国说”与“鲁阳说”之间久争不下。到了现代,随着争论问题的逐步清晰化,“鲁国说”因论据益穷而放弃论争,山东曲阜市亦不再参予。其四,是“鲁阳说”。墨子为鲁阳人,最开始是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时,经考证认为墨子为鲁人。《路史·国名记》认为,此鲁人之鲁,为“汝之鲁山县,非兖地”。到了清代,大学者毕沅据此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墨子“姓墨名翟,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武亿编纂嘉庆《鲁山县志》时,又把墨子里籍在鲁阳写入志书内,并说明“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鲁国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因“鲁阳说”记载最早,论据充分,又出自历代大家之口,因而得到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五、关于“滕州说”突起及其论争概况

根据以上介绍,墨子里籍鲁阳说经汉高诱清毕沅、武亿等考证,已成定论。但由于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仍存“鲁

人”、“宋人”两说,且明言此“鲁人”为“鲁国人”。并在《案语》中对毕、武之说进行反诘,成为“鲁国说”百年争鸣之源头。到了近年,由于名人效应和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鲁国之旧都所在地曲阜先开始把墨子列为本市历史名人进行研究,但由于史料遗迹等诸方面证据均欠缺而只好罢手。后一些山东学者又想把墨子里籍搬到荷泽市,并着手筹备墨子里籍研讨会,因史学界无人响应而终无结果。墨子里籍问题在山东呈现冷场局面。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有争议的历史悬案,只能依据历史事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考证,使其逐渐向历史事实靠拢,而不能以个人感情去任意枉说,更不可因一方利益而杜撰论据。历史上不乏秉公治学之士,正是他们破解了一桩桩历史悬案,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中国史学史。作为史学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向他们学习。如持鲁阳说的清代经学家、考据学家毕沅,就曾任河南、山东两地巡抚;把墨子里籍明确载入《鲁山县志》的武亿,是著名方志学家,也曾任山东博山县知县,他们都对山东、河南较为熟悉,又都是治史大家,既有实地考察之条件,又有史学研究之经验,为什么都把墨子里籍认定在河南鲁山而不是山东某地呢?道理自然只有一个,就是自己要对自己的立论负责,绝不囿于地域之见,而是肯定要下一番功夫考证的。当代学者、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刘蔚华先生,在经过严肃认真考证研究之后,亦在 1982 年第四期《中州学刊》上发表了力作《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一文,理清了为什么墨子为“鲁人”是指河南鲁山人,以及河南鲁山之古鲁国与曲阜古鲁国的上下相承关系。为“鲁阳说”找到了新的依据。可以说,这些古代与现代学者的秉公治史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是令人可钦可敬的。但遗憾的是,刘蔚华先生的结论性论述却惹怒了山东另外一些学者,他们被牢牢束缚于地域、门户之见,陷入已被史学界放弃的“鲁国说”内而不能自拔,且想当然地把“鲁国说”视为

“山东说”，先曲阜，后菏泽，再滕州，总之，非要在山东境域内给墨子安上“户口”不可。以滕州籍的山东学者张知寒先生等为首，在《枣庄日报》、《山东社会科学》杂志上针对刘蔚华先生的文章，先后发表了《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两文，把“鲁国说”变为“滕州说”，开了墨子里籍“滕州说”之端。枣庄市借机抓住墨子故里“滕州说”，从1991年6月起，不惜花费数百万巨款，在滕州连续召开了全国、国际墨子学术讨论会，建造墨子“遗迹”，立起墨子铜像，成立了墨子研究中心、墨子研究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原本鲜为人知的滕州借此名扬海内外。当然，在这一文化舞台下，也唱了一出经济好戏，向世界打开引资、贸易开放之门，获得了数亿元的效益。

在山东学术界打响的新一回合的墨子里籍之争，理所当然受到“鲁阳说”墨子故里河南省、平顶山市和鲁山县知识界的关注，萧鲁阳、杨静绮、郭成智、潘民中、杨晓宇、陈金展、郑建沛等同志进行了大量考证调查，在山东《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中州学刊》、《求索》、《平顶山日报》、《平顶山师专学报》、《墨子在鲁山的史料与传说》等报刊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墨翟故里考辨》、《墨翟故里觅踪》、《墨子里籍考辨》、《“儒墨同源”与“法夏紬周”考辨——兼论墨子里籍问题》、《墨子中的鲁山地区方言》、《墨子鲁山人十二证》、《关于墨子遗迹与墨教传承的调查》等一大批正面论证文章和《“墨子里籍滕州说”质疑》、《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与张振衡、徐治邦先生商榷》、《臆断岂敢立论、附会何能为据——评张知寒先生“墨子里籍滕州说”》、《对鲁国的再认识——兼与李永先、魏正峰等同志商榷》、《墨子滕州人说讹谬——读张知寒、李永先论文有感》等数十篇反驳论辨文章。平顶山市和鲁山县并保护性开发和对外界开放了一系列的墨子遗迹，省、市、县三级墨子里籍研究会也筹建起来，这一切都当然地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和受到大多数墨子研究专家的肯定。“滕州说”与“鲁阳说”关于墨子里籍之争被称

为国内继南阳与襄阳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的又一场跨省际历史名人之争大论战。

六、关于“鲁阳说”的论争优势

墨子里籍在鲁阳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豫鲁这场有关墨子里籍大论战中,“鲁阳说”当然存在着绝对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资料、方志、墨子研究典籍中有明确记载。主要有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的《墨子注》、清代武亿的《跋墨子》、《路史·国名记》、清嘉庆《鲁山县志·艺文志》、《鲁山县志·集传》、《鲁山志·循吏》、新纂《鲁山县志》、《平顶山历史名人传》、《平顶山名胜古迹》、《墨子在鲁山的资料与传说》、新纂《平顶山市志》等资料。而且,在方志中记载墨子里籍,嘉庆《鲁山县志》是全国旧志中唯一的一本,山东曲阜、滕州历代修志均无有墨子的任何记载。

2、《墨子》等书中有可靠的证据。其一,在《渚宫旧事》中,鲁阳文君对楚惠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也。”《吕氏春秋》中墨子向楚惠王自言为“北方之鄙人也”。这里的北方,自然是楚国北方,正与鲁阳在楚国北方的位置相一致,墨子在《鲁问》篇中,两次谈到自己是“中国人”,当时“中国”的概念,只指夏商活动的中原地区,严格地说,山东时为“东夷”,楚国时为“南蛮”都非“中国”之土,但鲁阳原是中原之地,为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现有尧的后代,夏的臣子刘累居鲁县的史料记载,今鲁山县著名省级旅游风景区石人山即本名尧山,上有尧祠与累亭等名胜古迹,墨子之祖,大禹之师墨如亦尧之后裔。周灭商后,鲁阳始为周王室姬姓封国,继而属郑,只是后来才被楚国吞并,成为楚国北方重镇。作为鲁阳人,墨子自称“中国人”,即中原人,是完全说得通的。他在《鲁问》中向鲁阳文君谈“中国之俗”,正是向不甚了解中原习俗的楚王室贵族子宽进谏

治理鲁阳之策。此“以中原之俗治中原之地”不失为墨子给鲁阳文君进献的定国之策。由以上例证也说明了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君民(臣)关系,进而可知墨子是鲁阳人。其二,墨子著作中有大量的鲁山地区方言。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萧鲁阳,鲁山县史志办副编审郭成智先生考证,《墨子》一书中有许多鲁山一带方言,如“荡口”、“隆火”、“安生生”、“强梁”、“不材”、“中不中”、“饥”等五十多处。而山东滕州则无此说法,只称“饥”为“饿”,称“隆火”为“点火、引火”;称“好不好”为“管不管”,更不说“中不中”。“中”字用法为明显的、极具特色的河南方言,甚至成为河南人口音的象征。语言,特别是一个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说是研究该地区历史情况的活化石,《墨子》一书中大量河南方言,鲁山方言的应用,是墨子里籍在鲁阳的有力证据。

3、鲁山县有大量的墨子遗迹:①上汤“墨子故里”石碑。立碑时间不知为何年,1934年因扩路被搬掉,1941年国民党汤恩伯部驻军鲁山,为修上汤花园和温泉浴池,把路旁历代石碑统作墙基,“墨子故里”碑从此埋入地下;②赵村乡中汤村“墨莲池”;③辛集乡龙鼻村“墨井”;④赵村乡、四棵树乡、熊背乡、辛集乡等八处“墨子庙”。⑤大茅山“墨子聚徒学艺处”;⑥董周乡“墨子为鲁阳文君解围处”;⑦四棵树乡“墨子请鲁班抽中心板”的古银杏树;⑧修石人山风景区发现的“墨子洞”,该洞有可能为墨子晚年创立隐灵教的第一教庭;⑨熊背乡“黑隐寺”,为墨子老年隐居地和卒葬地;⑩二郎庙乡“土掉沟”,相传墨翟为隐居故乡而去“土”为“黑”姓,鲁山黑姓亦视墨子为其始祖。此外,鲁山还有相当多有关墨子的遗迹与传说。

4、鲁山一直活动着墨家传人。他们长期宣传墨家思想,劝善禁恶,救世济人。这些人又多从事木工、建筑等技艺。并有一定的民间组织,如灤河乡黑石头村尹辰太,马楼乡关店村姜套等,他们尊“墨祖”,传“善人”,对外称“善巨”,与墨家“巨子”的称谓相一致。

这也与墨子弟子多楚人,墨家后传多南方人的情况不无关系。

5、今人的考证。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述,豫,鲁有关墨子里籍之争引起史学界极大反响,越来越多研究墨子的专家学者援笔介入来支持“鲁阳说”,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对“滕州说”进行反驳,以大量的历史依据和严密论证,证明墨子里籍只能在鲁阳。即便滕州利用其经济优势创造了“宣传效应”,但永远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力论据。

七、关于本书编辑出版中的几点说明

本书为国内诸多研究墨子之专家学者的一本文集,主要分四个部分:一是研究鲁阳墨子里籍的文章,这部分文章从西鲁与东鲁的关系、“鲁阳说”史料,鲁山县有关墨子遗迹、习俗及鲁山方言在《墨子》一书中的使用情况,鲁阳在夏代地理文化中的位置及墨家尊奉夏礼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论证,从而证明鲁山是墨子的故乡,其生地在今鲁山县赵村乡竹园村,其隐居地和卒葬地在今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二是坚持“鲁阳说”的部分专家学者与“滕州说”展开的论辨性文章,这类文章对“滕州说”立论者张知寒、李永先等先生所撰文章进行了辨驳,从论点、论据、论证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滕州说”论据的贫乏与立论的荒唐,证明墨子里籍只能是在鲁阳,“滕州说”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无中生有的杜撰之作。文笔之锋利、论争之激烈,辨析之透僻,论证之有力是这部分文章的突出特色。三是一些研究墨子思想的文章,这部分文章近年发表得太多,这里酌情收入几篇,主要是想让对墨翟和《墨子》一书不太了解的读者有一个大略了解的机会。墨子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作者来说,不是能够在几篇文章里就可以全面反映的,对于读者,也不是能够在读几篇有关研究文章或几本研究书籍就能全部把握和全部了解的。因此说,对于有兴趣研究《墨子》或是墨子里籍的

同志,这本书就算是一块引路的标识。您认认真真地读完它,您踏踏实实地走过去,就会发现在《墨子》这一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容量是那样庞大,知识是那样丰富,思想是那样深邃,体系是那样完美。尽管现在还不能看到《墨子》七十一篇的全部,但它所蕴含的精华,照样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四是一些资料性附录,这些资料或是有关墨子里籍鲁阳说的史料,或是古今中外治《墨》方家对墨子的评价,意在从文字材料上给前列诸文的论点论据一个佐证。当然,其目的还在于,从这些附录资料中,再一次告诉广大读者,墨子里籍在河南鲁山,而不是在山东滕州。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所选论者的文章,不一定是代表之作。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还望读到这本书的墨学方家、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我们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六日